

重構空間：1919前後 中國激進思想裏的世界概念

• 程 農

引 言

一位論者寫道：「現代社會對歷史的認知已經一邊倒地為民族國家所框限。」^①五四的世界空間感不為史家所重視，或許與此不無關係。對五四的各種敘述都強調，五四思想與關心民族救亡有深刻聯繫，但需要補充的是，關心民族救亡與信奉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是兩件非常不同的事情。

本文的主題是，五四高潮期即1919年前後的時期，主流思想曾一度為世界主義觀念所滲透，強調全球事態已一體化的世界整體觀念也極有影響。這兩者的辯證交織，構成了五四高潮期的一個思想基調，並且深刻地捲入了激進主流對中國問題的界定過程。伴隨着傳統天道秩序觀念的解體，近代轉型期思想的根本內容就是選擇新的秩序框架。它們可以是地方區域（例如省自治、聯省自治，包括毛澤東1920年的「湖南共和國」構想），可以是民族國家，可以是亞洲、黃種一類，也可以是世界整體、國際運動。這些不同空間在具體思想中往往形成複雜多樣的結合。在五四高潮期，正是立足全球的空間界定，參與了這段時期思想的激進化。

我想通過這一案例強調1919年本身的思想史意義。以往無論是大陸傳統的五四敘事，還是自由主義的五四敘事，實際都是將1919年界定為「新舊交替」的思想過渡期，1919年沒有屬於自己的思想形象。然而，只要正視1919年，就會發現，一方面，先前的新文化主題這時已被深刻地改造，形成若干有持久影響的新理念^②；另一方面，1920年春以後，部分激進人士的共產主義選擇也只有通過正視1919年才能得到富有歷史感的說明^③。事實上，五四的世界概念主要就是1919年泛社會主義思潮這一脈絡裏的內容，本文對這一方面的考察，便已可以顯示1919年的若干思想史特色。

我將重點指證：(1) 五四高潮期激進思維轉向對「社會問題」和經濟力量的

1919年前後，中國主流思想曾一度為世界主義觀念所滲透，強調全球事態已一體化的世界整體觀念也極有影響。各種主義都在搶佔發言陣地，當時面臨的可能性之複雜多樣，已非塵埃落定後的今天所能想像。

關注，使得世界空間觀念獲得了空前的充實與激進性；(2) 從全球空間視角產生了對中國問題的新界定，這反過來意味着世界概念成爲一種關於全球資本主義等級秩序的結構性概念；(3) 在共產主義者論辯自己選擇的「社會主義論戰」中，世界結構概念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社會」視野裏的空間

從思想史的角度觀察，自清末以來，世界主義與世界整體觀念雖然一直在思想格局裏佔有一席之地，但1919年前後主流激進思想已發生社會主義轉向，爲世界概念提供了新的強大資源，使之變得既鮮明具體又高度激進化。這種同時對各種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流派感興趣的社會主義轉向，是多種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其歷史含義也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標誌是主流問題意識發生巨變，從關注國家政治一變而爲以「社會」爲根本問題^④。社會主義思想進入主流的歷史脈絡，表現爲對整個社會的不平等的強烈敏感，對各種群體在總體結構中位置高下懸殊的強烈敏感。在這種感覺支配下，整個社會結構便成了「問題」。這種感覺在1917年已露出端倪^⑤，而無政府主義思想大行其道使問題更加鮮明，它抓住「勞動」，將「社會問題」構造爲一種兩極對立^⑥。1918年3月創刊的《勞動》寫道：

方今「勞動問題」日縈繞於歐美政治家頭腦，日喧聒於全世界人士之耳膜，問題者何？階級戰爭也。不耕不作而幸福美滿者爲一級，上焉者也；勤耕苦作而果厄顛連者爲一級，下焉者也。不平斯爭，問題起矣。

文中宣布，要「明社會問題之真相，促進我國勞動者與世界勞動者一致解決社會問題」^⑦，到1919年，這種感覺已瀰漫於主流思想。

對思想主流來說，這裏的問題意識的確是全新的，與先前的政治視野不同，在清末以來「群與群爭，種與種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視野裏，焦點問題就是通過民主政制塑造公民身分和實現民族凝聚，以達致建構民族國家的目的。即便是注重文化變革的新文化運動，內容與歸宿也依然籠罩在政治關懷之中^⑧。然而，現在視野已由「政治」變爲「社會」，焦點問題不再是種群衰弱，而是種種類型的不平等了：「我們如果會看破現社會的組織是和最大多數的福利相衝突，現社會的生活是犧牲大多數去逞少數人私欲的生活，是不平等的事，一定要找個較好的社會來代替。」^⑨在這種「看破」面前，「社會」不再爲「民族」的形象所覆蓋，而是直接顯示爲一個縱橫交錯的強權結構。這一視野並未將民族救亡與共和政治問題拋到一邊，但通過新的界定，它們已是作爲民族不平等、政治權力不平等而成爲種種不平等的一部分，涵義非常不同了。

我想強調，這種問題意識的巨大轉換，意味着空間概念的巨大轉換。從世界體系分析問題的論者指出，現代化理論對空間關係的漠視（即對一社會中各群體結構位置不同的漠視，對全球中心—邊緣結構的漠視），意味着對決定這些差

1919年前後主流激進思想的社會主義轉向，標誌着主流問題意識發生巨變，從關注國家政治一變而爲以「社會」爲根本問題。發現「社會」，意味着產生一種新的敏感。在這樣的感覺下，整個人間從結構上便成了「問題」。

異的不平等權力的漠視^⑩。而五四對強權無所不在的體驗，在疏離民族國家話語的同時，自然也就在喚起對空間關係的敏感。社會達爾文主義原本就以種族、民族為當然的最高單位^⑪，嚴復「群與群爭，種與種爭」的詮釋使這一觀念更加強化，然而，現在社會達爾文主義本身遭到了質疑。在1919年，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成為主流論題絕非偶然，它自稱的生物學依據，使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科學權威性遭到質疑，從而瓦解了國家政治主題的基本視野。依據「互助」思想，小組織大聯合成為當時社會烏托邦構想的基本思路。

社會主義思潮將「社會問題」進一步聚焦為「勞資問題」，聚焦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對立。與此相應，有關「階級」和「階級鬥爭」的論述，構造出全球性的兩極對立，更使得民族國家話語顯得不着邊際。在《新潮》裏，這還是溫和的：「不獨弱小的民族，弱小的國家，對於強大的民族，強大的國家，要求解放，即弱小的階級，對於強大的階級，也有要求解放的運動。」^⑫到了李大釗，問題與世界空間的聯繫就極其鮮明了^⑬：

從今以後，生產制度起一種絕大的變動，勞工階級要聯合他們全世界的同胞，作一個合理的生產者的結合，去打破國界，打倒全世界資本的階級……這個新紀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紀元，是人類覺醒的新紀元。

尤有甚者，由於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影響，國家已成為直接的攻擊目標，「世界主義」本身就成為當時流行的口號。幾乎一切現存制度，都被從是否產生壓迫、分裂人類的角度予以衡量，而人類的希望只能是徹底重建社會。在這樣的視野裏，國家是應予否定的強權，民族是分隔人類的藩籬，諸如建立共和體制、處理個人與國家的關係等等，都已不再成為需要認真對待的事情。五四高潮期的典型態度是，在個人與人類之間的一切劃分都應予質疑。用李大釗的話來說，就是「我們現在所要求的，是個解放自由的我，和一個人人相愛的世界。介在我與世界中間的家國、階級、族界，都是進化的阻障、生活的煩累」^⑭。在五四高潮期的報刊上，這樣的表達可說是數不勝數。

在1918年對十月革命的詮釋中，中國激進思想對世界主義的強調已經異乎尋常。到1919年，世界革命更成了眼前活生生的圖景。「時機到了！世界的大潮捲得更急了！」「人類解放期就在目前了！」報刊大量刊載各國革命和騷亂的消息，塑造出一種世界正在根本轉型的門檻上的氛圍。



在1918年對十月革命的詮釋中，中國激進思想對世界主義的強調已經異

在1918年對十月革命的詮釋中，中國激進思想對世界主義的強調已經異

乎尋常^⑥。到1919年，世界革命更成了眼前活生生的圖景。「時機到了！世界的大潮捲得更急了！」「人類解放期就在目前了！」報刊大量刊載各國革命和騷亂的消息，塑造出一種世界正在根本轉型的門檻上的氛圍。五四事件中學生運動與工人運動的突起，更顯得中國也在融入世界大轉型的巨流。新興的「社會」視野恰好與這種圖景相輔相成，前者為後者提供概念詮釋，後者為前者提供經驗內容，全球空間的一體性從未像此時這樣地栩栩如生。

從這樣的歷史脈絡看下來便不難理解，與自由主義在國家、社會的相互關係裏界定「社會」不同，激進思想何以要近於偏執地將「國家」與「社會」對立起來。例如，陳獨秀在1919年底就宣稱，「近代思潮」是「國家的」，而「最近代思潮」是「社會的而非國家的」^⑦。既然「社會問題」是「世界公同之一問題」，歷史的脈動就已經無法在單個國家的空間裏把握，對「社會改造」的巨流而言，有首要意義的單位只能是「世界」本身。

經濟力量與世界一體化

除了對「社會」的發現外，還有一個特別的因素促進了世界空間感的崛起，這就是主流激進思想對經濟力量的體認。如許多論者所述，1919年的社會主義思潮是籠統混雜的，人們大都不關心各種主義自身的內在邏輯，而是對它們的思想成分進行着各種拆解與組合。在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案上，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等讓人眼花繚亂，但它們對「社會問題」的分析卻比較單薄，在這方面，馬克思理論一開始就被承認佔有優勢。人們普遍認為馬克思學說有力地分析了社會問題，只是其在解決問題的方法上主張系統地運用階級鬥爭的手段過於激烈，應實行其他的解決辦法。甚至李大釗也建議用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來補充其不足。由此，無論解決方案上的「主義」如何眾多，馬克思在社會分析方面倒是有普遍影響^⑧。

十月革命使中國重視馬克思，但1919年人們了解馬克思學說的主要資源卻來自考茨基、河上肇等。在他們的解說下，人們最感啟發的是馬克思對社會之經濟基礎的強調。事實上，從1919年初到1920年春，馬克思的基本形象就是「經濟學家」、「社會主義經濟學的鼻祖」，馬克思主義則是「開創了經濟科學的新時代」，是關於歷史與社會的經濟理論。由於遠未把握馬克思理論的辯證特質與複雜論式，也不能重視其作為一種社會革命理論的潛能，人們便對馬克思理論作近乎經濟主義與決定論的解釋，視其為「經濟史觀」、「經濟定命說」或「社會組織進化說」^⑨。

雖然將學說簡單化了，但這種歷史決定論理解卻空前地突出了經濟力量，對「社會」概念的界定作了質的充實。「經濟」的發現，賦予「社會」前所未有的總體性，使之成為一個整全的「社會形態」，並且依靠自身內部的發展動力歷史地演進。在這種總體性背景上，強調貧富、勞資、婦女等等問題就不再是事實的直觀，而是具有了厚重的歷史感；各種問題也不再只是壓迫、強權的一堆表現，而是結構性地相互關聯。

儘管在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案上，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等讓人眼花繚亂，但它們對「社會問題」的分析卻比較單薄，在這方面，馬克思理論一開始就被承認佔有優勢。事實上，從1919年初到1920年春，馬克思的基本形象就是「經濟學家」、「社會主義經濟學的鼻祖」。

從實際史料看，在泛社會主義，尤其是其中泛無政府主義理念的脈絡裏，人們只是抓住了布爾什維克關於經濟發展已與國界衝突的這一結論，這與對馬克斯的複雜理論也主要只抓住了經濟決定作用一樣，共同表明了五四激進思維具體解讀這方面思想資源的方式。

「社會問題」經歷史決定論的如此改造，本身就更揭示了局限於國家本位把握不住問題的實質。但這還是間接的，在直接意義上，「經濟史觀」就為立足全球提供了支持。民族主義論述總是當然地預設，民族與民族國家是天經地義的存在，但現在它們卻被認為是社會發展到特定歷史階段的暫時現象；民族國家的形象原是全體國民賴以託命的共同體，而現在卻被解釋為經濟力量的產物、社會分裂的結果，甚至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儘管世界主義觀念早就宣稱「國家主義」已經過時，但將一個被認為超越歷史的神聖存在徹底地歷史化，顯然更具有釜底抽薪的力量。在這樣的歷史必然性脈絡裏，《共產黨宣言》的名言「工人無祖國」就不大像是對主張的宣告，反倒像是對事實的陳述了。值得強調的是，上述論旨只是馬克思唯物史觀邏輯蘊含的推論，並非其所注意強調的問題，而五四思想卻迅速運用了這樣的論證，將其當作了一大主題予以強調：「從前家族主義、國家主義的道德，因為他是家族經濟、國家經濟時代發生的東西，斷不能存在於世界經濟時代的。今日不但應該廢棄，並且必然廢棄。」^{①9}還有人描述說：近代「是個人主義與國家主義的文明」，正在逼近的則是「社會主義與世界主義的文明」^{②0}。在1919年的中國語境裏，對唯物史觀這種有側重的運用，正可揭示當時人們對空間界定的高度關注。

當時，在歐洲的時空裏，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已經大幅度強化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的全球空間維度。至於托洛茨基、列寧等對俄國革命合法性的論證，就更是塑造出明確的世界結構性概念。但這些理論闡述當時大多尚未傳入中國，例如在五四高潮時，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就未被國內看到^{②1}。另一方面，列寧、托洛茨基倒確有不少涉及「世界革命」的政治宣傳言論為激進人士所了解，並且往往因無政府主義式的詮釋而強化。舉例而言，1919年的《解放與改造》第一卷第二號就刊載了日本人寫的〈列寧與脫洛斯基之人物及其主義之實現〉的中譯文，其中寫道：「廣義派觀察現組織之根本的大缺陷，以為在因國家之存在為經濟上獨立單位，擁護資本家之利益滿足帝國主義者之野心故……法蘭西革命之後，資本主義勃興，生產力漸示超越國境之傾向，然一切利益獨為資本家所壟斷……實際之生產者（即世界之勞動階級）固不能與彼等行為同調，以擁護今所謂國家，正宜協力打破資本家之經濟組織，以建設世界的經濟。」該刊第一卷第八號又發表托洛茨基《布爾什維克與世界和平》一書的節譯，同樣傳達了上述觀點。

值得指出的是，由於列寧帝國主義理論等有關信息的匱乏，也由於缺乏對其與第二國際「正統馬克思主義」的論辯背景的了解，五四激進思維遠未能把握其曲折的論式。從實際史料看，在泛社會主義，尤其是其中泛無政府主義理念的脈絡裏，人們只是抓住了布爾什維克關於經濟發展已與國界衝突的這一結論，這與對馬克斯的複雜理論也主要只抓住了經濟決定作用一樣，共同表明了五四激進思維具體解讀這方面思想資源的方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解讀並不關心考茨基、河上肇等的完整思路，而是自然地將他們強調的馬克思經濟學說與蘇俄傳來的國家界限已過時的信息，作了新的組合。

事實上，早在1918年末，由於對馬克思學說已有一定研讀基礎，也了解列寧的一些思想，並且讀過了托洛茨基的《布爾什維克與世界和平》，李大釗就已

陳述了這種直接具有世界空間感的分析，他寫道：

他們(按：指布爾什維克)的目的，在把現在社會主義的障礙的國家界限打破，把資本家獨佔利益的生產制度打破。此次戰爭的真因，原來也是為把國家界限打破而起的。因為資本主義所擴張的生產力，非現在國家的界限內所能包容；因為國家的界限內範圍太狹，不足供他的生產力的發展，所以大家才要靠着戰爭，打破這種界限，要想合全球水陸各地成一經濟組織，使各部分互相聯結。

只是，資本家的政府是想通過戰爭由一強國進而成為世界大帝國，而布爾什維克則要實現「全世界合於人道的生產者合理的組織的協力互助」。李大釗強調：「他們的戰爭，是階級戰爭，是合世界無產庶民對於世界資本家的戰爭」，正是順着這樣的論述脈絡，他的空間感成了全球一體的了：「二十世紀的群眾運動，是合世界人類全體為一大群眾……這種世界的社會力，在人間一有動盪，世界各處都有風靡雲湧、山鳴谷應的樣子。」^②到1919年，這就更是主流普遍的觀點了：「這次大戰把第二種文明(按：指資本主義文明)的破罅一齊暴露了：就是國家主義與資本主義已到了末日，不可再維持下去了」^③，「資本主義支配下的社會，已經沒有存在的餘地了！」^④

從發現「社會」到「社會」獲得經濟的形象，世界空間隨思想的激進化而愈益逼真與實在。在這樣的視野轉換中，中國問題的含義也相應地變化了。

全球結構裏的中國問題

儘管世界空間概念已經得到了社會與經濟涵義的充實，但是，籠統的經濟決定論只能推出籠統的世界一體性，然而這種世界一體性與中國問題的關係是甚麼，卻無法從生產力發展與國家界限發生衝突這樣籠統的陳述中直接推出的。在這個意義上，我要強調，將中國問題放入全球空間裏，並從資本主義世界秩序來考察，實際是1919年中國語境裏的一個創造性的動向。

清末民初的主流思維一直明確地認為，中國近代的受挫只應從自身內部因素找原因，在自強變革上努力，列強的侵侮中國只是結果而不是原因。因為照嚴復介紹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觀點，國家、種族的優勝劣敗原本是永恆的「天演」法則。然而，人們一旦將中國的近代遭遇放入世界空間，從資本主義體系的全球擴張來觀察時，優勝劣敗的客觀面目頓時喪失，中國問題的解釋變得與等級性的全球資本主義宰制不可分割了。在1919年夏秋創刊的《解放與改造》上，張東蓀寫道^⑤：

因為有一個極大的勢力，自從西方壓倒東方。……這個私有衝動的組織力所發現的制度便是資本主義與國家主義。西方各民族用了這個組織力來壓迫我們：就是拿政治方面的國家主義與經濟方面的資本主義合併來征服我

清末民初的主流思維一直明確地認為，中國近代的受挫只應從自身內部因素找原因。然而，人們一旦將中國的近代遭遇放入世界空間，從資本主義體系的全球擴張來觀察時，社會達爾文主義優勝劣敗的客觀面目頓時喪失，中國問題的解釋變得與等級性的全球資本主義宰制不可分割了。

們。我們好像被一塊大石壓着，沒有活動的餘地。資本主義的性質有兩點：一個是集中的趨向，一個是壓制的勢力。集中的趨向就是只有小資本集成大資本的趨向，沒有大資本散作小資本的趨向。壓制的勢力就是大資本能把小資本吸收了。這兩點是相輔翼的，簡單說起來，就是只有大資本吸收小資本，沒有小資本抵抗大資本的道理。從這個原理講來，無論中國怎樣募集資本，終是不能抵抗外國資本的。

在此前後，《建設》雜誌上也刊出了戴季陶類似的觀察^②：

歐美所發生的社會問題，根源是在他本國資本家組織的機器生產。中國所發生的社會問題，根源是在外國輸入的資本家組織的機器生產。歐美所發生的社會現象，是「農民的工人化」，是「直接生產的工人的奴隸化」，是「中流階級的平民化」。中國所發生的社會現象，這些是極少數。頂重要的事實，就是從前家庭工業、徒弟工業和農業的生產者，受外來機器製造品的壓迫，多數變了失業者……滿清政府的滅亡的總原因，是在多數人民生活根據的動搖。多數人民生活根據的動搖，是在外來大資本家組織的生產品的大壓迫。……我們看中國過去及現在種種的變象，都是由歐美日本的壓迫所誘發出來的……現在各國的缺陷都一致的暴露出來，所以國家改造和社會的改造，已經成了全世界一致的聲浪。

「帝國主義」一詞在清末即已被人使用，但它的涵義基本為民族單位的空間概念所左右，梁啟超就認為它只是列強民族國家的膨脹，根本沒有從全球結構來理解它。現在，在新的視野裏，問題已經不是在一個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秩序裏如何謀求民族的強國地位，而是徹底改造這一秩序本身。

由於中國問題的具體性，人們原則上已經不得不分析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具體結構，並且要具體到說明中國在全球政治—經濟秩序裏的特定位置的程度，因而1919年思想已經開始涉及等級性的資本主義世界結構的意象了。

事情還不止此。五四事件中工人的政治行動固然為社會主義思潮提供了助力，但中國近代產業的單薄卻是難以否認的事實。針對這一問題，李大釗從等級性的世界結構觀點，得出了一個重要的描述。他說，西方資本制度的經濟需要，驅着他們來日益壓迫東方尤其是中國，中國的農業與手工業多被其工業經濟壓倒，由此^③：

全國民漸漸變成世界的無產階級，一切生活，都露出困迫不安的現象。在一國的資本制下被壓迫而生的社會的無產階級，還有機會用資本家的生產機關；在世界的資本制下被壓迫而生的世界的無產階級，沒有機會用資本家的生產機關。在國內的就為兵為匪，跑到國外的就作勞苦的華工，輾轉遷徙，賤賣他的筋力，又受人家勞動階級的疾視。歐戰期內，一時赴法赴俄的華工人數甚眾，戰後又用不着他們了，他們只得轉回故土。這就是世界的資本階級壓迫世界的無產階級的現象。

於是，出路也只能在世界結構層面尋找：「我們可以曉得中國今日在世界經濟上，實立於將為世界的無產階級的地位。我們應該研究如何使世界的生產手段和生產機關同中國勞工發生關係。」

依照清末民初盛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圖景，每個群體的命運只能由其自身負責。但1919年的激進思想卻轉而認為，中國問題不能再孤立地理解，對它必須從資本主義歷史性的全球等級秩序中作結構性的把握。如果世界資本主義已經塑造出一種宰制的機制，持續地、系統地制約着中國富強的可能性，那麼首先要做的就不是埋頭自強，而是改造世界體系本身。

這種變化並不只是李大釗這樣日後成為共產黨的人所獨有，上面例子所涉及的《解放與改造》和《建設》，分別屬於偏向基爾特社會主義的張東蓀一派，與主張民生主義社會政策的孫中山派，兩刊都是當時社會主義思潮裏的代表刊物。因而，從資本主義的全球宰制來界定中國的位置與遭遇，可以說是1919年主流激進思想本身的普遍動向。這種動向不僅改變了清末民初的思路，而且與20年代初從蘇俄接受的共產國際版本的「帝國主義」論述也非常不同。此種不同在1920年激進陣營內部論戰的發揮裏，有了一個醒目的表現。

「共產主義」選擇的論證策略

在當時的語境裏，「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有其特定的用法。借用陳獨秀〈社會主義批評〉一文的概括，當時的「社會主義」一詞是泛指各種反資本主義的學說，其中最重要的有五種，即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工團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才是指蘇俄的類型²⁸。本節要討論的就是，從1919年泛社會主義思潮中塑造的世界空間概念，如何參與了1920年底到1921年初對「共產主義」選擇的論述。

1920年春夏，隨着激進知識界若干烏托邦試驗的幻滅，加上共產國際的直接介入，走俄式革命道路的問題開始鮮明地被提出了。有趣的是，當維經斯基到上海時不僅找了陳獨秀，而且經陳的介紹，找了《建設》、《星期評論》的戴季陶，和《解放與改造》、《時事新報》的張東蓀，甚至鼓動一起成立「社會主義者同盟」。而北京、廣州的共產主義小組也包括了無政府主義的代表人物。這形象地反映出，在這個歷史的瞬間，激進主流尚未明確分化的思想格局。

隨組織約束與思想交鋒的交互作用，分化是不可避免的。這是一個曲折複雜的故事，其中一個核心的情節是，從1920年末到1921年春，在張東蓀、梁啟超等與正在組黨的共產主義者之間，就中國是否有資格立即進行社會主義運動發生了一場論戰。如前所引述過的，張東蓀先前曾是從全球資本主義等級結構來界定中國問題的宣傳者，在這次論戰中，他也自承以前是主張「與俄國通力合作，以共產主義推翻世界的資本主義」。他轉換立場的契機是羅素 (Bertrand Russell) 認為中國應先發展實業，以及他陪羅素在內地旅行由經濟落後所生的感想。伴隨這一立場轉換，他顯然又轉向了以國家為單位觀察問題²⁹。

張、梁等認為，由於中國產業薄弱，缺乏社會主義運動的經濟條件，再加上工人階級弱小，由此缺乏社會主義運動的政治條件，所以中國不能立即進行社會主義運動，不僅俄式革命不行，甚至他們自己傾向的基爾特社會主義也不

1919年的激進思想認為，中國問題不能再孤立地理解，它必須從資本主義歷史性的全球等級秩序中作結構性的把握。如果世界資本主義已經塑造出一種宰制的機制，持續地、系統地制約着中國富強的可能性，那麼首先要做的就不是埋頭自強，而是改造世界體系本身。

1920年春夏，走俄式革命道路的問題開始鮮明地被提出了。有趣的是，當維經斯基到上海時不僅找了陳獨秀，亦找了主張民生主義社會政策的戴季陶和偏向基爾特社會主義的張東蓀，甚至鼓動一起成立「社會主義者同盟」。這反映出激進主流尚未明確分化的思想格局。

行。陳獨秀等人的立場是，只要將中國問題放到全球結構裏觀察，結論就會是，中國可以經由蘇俄式的革命實施社會主義。

顯然，立足甚麼空間維度是區別雙方思路的首要因素，從全球結構界定中國問題已成為共產主義選擇的基本論述策略。他們幾乎都是開宗明義就強調這一點：那些反對在中國實行社會主義的人的「最大的缺點，是忘記了現代人類底經濟關係乃國際的而非國別的了（按：着重號為原文所有）。如果他斷定歐美資本制度要崩潰能講社會主義，他便不應該說中國不能講社會主義仍要採用資本制度。因為交通便利，需要複雜底緣故，有許多事都漸漸逃不了國際化，經濟制度更是顯著；各國資本制度都要崩潰，中國哪能夠拿國民性和特別國情等理由來單獨保存他」（陳獨秀）^⑳；「要問中國今日是否已具實現社會主義的經濟條件，須先問世界今日是否已具實現社會主義的傾向的經濟條件，因為中國的經濟情形，實不能超出於世界經濟勢力以外」（李大釗）^㉑；「現在的經濟變動是世界的不是國別的了」（李達）^㉒。

梁啟超說：「吾以為社會主義所以不能實現於今日之中國者，其總原因在於無勞動階級。」^㉓但在全球結構的眼光下，前述李大釗的「無產階級民族」式的論辯現在得到了發揮：「中國雖未經自行如歐、美、日本等國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實業，而一般平民間接受資本主義經濟組織的壓迫，較各國直接受資本主義壓迫的勞動階級尤其苦痛」（李大釗）^㉔；「就中國說，是國際資本階級和中國勞動階級的對峙」（李達）^㉕；「中國全民族對於歐美各國是站在勞動的地位」（陳獨秀）^㉖。

值得注意的是，張、梁等實際是以對馬克思的第二國際式正統理解為主要論據的，其不明言的分析單位就是民族國家。事實上，列寧等在發動十月革命



時曾面臨同樣性質的問題，而他們的論辯思路就是從西歐與俄國所構成的結構關係來看問題。如前所述，這時的中國共產主義者並未了解列寧式的這一曲折論式。他們在反駁張東蓀等時所採用的全球結構概念，應當主要淵源於五四高潮時的思想發展。

最可注意的是，這一論辯又進一步塑造了先前的世界結構概念，中國不僅被認為遭受資本主義體系的宰制，而且更被認為在這種全球資本主義等級結構裏佔有特殊重要的位置。它「是世界各資本國的唯一市場」(何孟雄)，「是萬國的商場，是各資本國經濟競爭的焦點，是萬國大戰爭的戰場」(李達)。這裏蘊含的結論是高度激進的，中國不僅有資格加入共產主義革命的世界巨流，而且在其中要扮演決定性的角色。耐人尋味的是，此時捅破這層窗戶紙的竟是梁啟超的論戰文章〈覆張東蓀書論社會主義運動〉：

資本主義將興於中國，其機運殆已成熟，斷非吾儕微力所能抗拒。吾國之資本家，雖不足道，然全世界之資本家，在其本國，各皆已陷於窮蹙之地位，勢必以中國為逋逃藪；中國秩序稍恢復之後，各國之資本，必如狂瀾倒捲以注於吾土……須知吾國勞動階級將來之敵手，非中國之資本家也。中國資本家區區鷄肋，抑何足以當尊拳？吾確信在稍遠之將來，必有全世界資本家以中國為逋逃藪之一日。而中國勞動階級最後之戰勝，即為全世界資本主義根株斷滅全世界互助社會根本確立之時……全世界資本主義之存滅，可以我國勞資戰爭最後之勝負決之。

梁氏的這段話顯然展示了1919年式的世界空間感，這可以佐證本文上節強調的空間概念的激進化是1919年主流共同的趨向。當然，在梁氏那裏，這種決戰是中國經歷一個資本主義發展階段之後才能發生的事。因而，只是對不可知的將來，從全球結構關係作分析才起主導作用，而就眼前而言，還是國家單位是首要的，由此便得出一個改良性質的行動方案。

1920年的這一事件，生動地顯示了1919年世界空間概念的激進潛能。然而，這種激進性質已經超出了限度，以致在20年代的政治格局裏，它的命運只能是淡出。不必說自由主義者、國家主義者以至孫中山等從不同角度對它的抨擊^①，即便是中共，在追求務實政治行動的過程裏，也不得不壓抑它的激進性質。事實上，20年代從蘇俄接受的「帝國主義」論述，已經為實際政治戰略所深刻地塑造，以致很容易就被民族主義話語所改造和運用^②。只是在一些歷史的片斷裏，我們才能偶爾一瞥這種世界空間感的驚人表演^③。

梁啟超的論戰文章〈覆張東蓀書論社會主義運動〉，生動地顯示了1919年世界空間概念的激進潛能。事實上，20年代從蘇俄接受的「帝國主義」論述，已經為實際政治戰略所深刻地塑造，以致很容易就被民族主義話語所改造和運用。只是在一些歷史的片斷裏，我們才能偶爾一瞥這種世界空間感的驚人表演。

註釋

① 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3.

② 例如，反代議制的高度理想的「德謨克拉西」觀念就主要是1919年的思想塑造而成，又如近代中國的民粹主義也主要是在這段時期發生的。

③ 閱讀、討論以至贊同馬克思的若干理論思想，與以馬克思主義（或者說共產主義）為意識形態信念，是兩件非常不同的事情。本文同意德利克（Arif Dirlik）的論點，認為1920年春以前，中國不存在後一種情況。即便是李大釗也主張用克魯泡特金等人的思想來補充馬克思。明確這一點，對於界定1919年的思想史位置至關重要。實際上，意識形態信奉的塑造，相當地依賴於1920年夏共產黨組織初步成立後的組織邏輯與思想論爭的交互作用。見Arif Dirlik,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④ 對這一問題的簡單討論，可見Arif Dirlik, *Revolution and History: the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37-38。這種對「社會」的發現與西方近代思想的發現社會全然不同，可對照波蘭尼（Karl Polanyi）：《鉅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台北：遠流出版社，1986）。

⑤ 例如《新青年》三卷二號所載陶履恭的〈社會〉一文就寫道：「社會，社會，此近來最時髦的口頭禪，以之解釋萬有現象，冠諸成語之首者也……政治之齷齪，則歸咎於社會；教育之不進，則溯源於社會；文學之墮落則社會負其責，風俗之澆漓則社會蒙其垢，要之，無往而非社會。」

⑥ 在1919年以前，新文化運動批判禮教固然會導致對家族制度壓迫性的敏感，但無政府主義卻是激發「社會問題」敏感的主要思想資源。人們不一定系統接受無政府主義的理論，但無政府主義者確實通過自己的刊物和對其他刊物的積極投稿，為激進思想提供了一系列新的表達詞彙，影響了人們感受「社會」的方式。瞿秋白以後曾說：「迎受『社會主義』的學說，其實帶着無政府主義的色彩。」對強權支配之敏感無政府主義的聯繫是顯然的，而「社會問題」被聚焦於「勞動問題」，也與無政府主義密切相關。在這個背景上，其他社會主義思想進入主流則使得「社會問題」的界定更加具體多樣了。關於無政府主義對塑造五四社會主義思潮取向的作用，德利克有詳細複雜的討論，見Arif Dirlik, *Anarch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chap. 5。另見蔣俊、李興芝：《中國近代的無政府主義思潮》（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0），尤其第七、八章。

⑦ 〈勞動者言〉，見《勞動》，一卷八號。引自葛懋春、蔣俊、李興芝編：《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上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頁362-63。

⑧ 陳獨秀最初的動機明顯是政治性的，民初共和政治的失敗使他認為必須以「國民運動」取代「政黨運動」，才能真正建立共和；而要形成「國民運動」，就必須先倡導「倫理之覺悟」。他所說的「吾人最後之覺悟」也是列舉了兩項，一是「政治之覺悟」，二才是「倫理之覺悟」，而這種倫理覺悟的內容基本上是從政治需要來推導的：「吾人果欲於政治上採用共和立憲制，復欲於倫理上保守綱常階級制，以收新舊調和之效，此絕對不可能之事。蓋共和立憲制，以獨立、平等、自由為原則，與綱常階級制為絕對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廢其一。」胡適參與《新青年》陣容時，說要「二十年不談政治」，也反映了他對新文化運動歸宿的理解。

⑨ 〈動的社會觀〉，《新社會》，第十四號。

⑩ Arif Dirlik, *After the Revolution: Waking to Global Capitalism* (Hanover, N.H.: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4), 66-68。另可參見Immanuel Wallerstein, *Historical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1983)關於政治部分的討論。

⑪ 杜贊奇（Prasenjit Duara）認為，社會達爾文主義是由線性歷史、種族、民族三者相互支撐而形成的一個封閉性論述，其中民族由種族發展而來，並成為線性歷史的主體。同註⑩書，頁19-20。

⑫ 〈朝鮮獨立運動感言〉，見《新潮》，第一卷第四號。

⑬ 〈新紀元〉，見《李大釗文集》，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頁608。

⑭ 〈我與世界〉，見《李大釗文集》，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頁23。

⑮ 國內對十月革命的理解最初頗受無政府主義的影響，極力渲染其世界革命的色彩。例如，於1918年2月最早歡迎十月革命的無政府主義雜誌《勞動》宣稱：「俄人

做的，是世界的革命，社會的改革，國家思想簡直半點也沒有……所以研究俄事，不可不以新眼光觀察之。」「李寧是素來主張大同主義的最熱心家。」1918年7月李大釗的〈法俄革命之比較觀〉也說：「法人當日之精神，為愛國的精神，俄人之今日精神，為愛人的精神。前者根於國家主義，後者傾於世界主義。」同註⑳書，頁573。

⑲ 見陳獨秀：〈自殺論——思想變動與青年自殺〉，載《新青年》，第七卷第二號（1920年1月1日）。

⑳ 這是德利克的概括，他對1920年春以前馬克思學說在思想格局裏的具體位置有富有歷史感的分析，見Arif Dirlik,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chap. 6.

㉑ 可參見楊奎松、董士偉：《海市蜃樓與大漠綠洲——中國近代社會主義思潮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第八、九章。並可見德利克對此的討論。

㉒ 〈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載註㉑書，頁152。

㉓ 張東蓀：〈第三種文明〉，見《解放與改造》，第一卷第一號。

㉔ 李大釗在1921年7月的〈俄羅斯革命的過去及現在〉一文中列舉了列寧的十九種著作，其中包括《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末日》，但李大釗說自己只看到《蘇維埃政府的要圖》、《國家與革命》及一本列寧與托洛茨基的演講合集，由此可見當時人們對列寧理論的信息之少。見註㉑書，頁480-81。

㉕ 〈Bolshevism的勝利〉，載註㉑書，頁602-603。

㉖ 鄭振鐸：〈現代的社會改造運動〉，載《新社會》，第十一號。

㉗ 張東蓀：〈我們為甚麼要講社會主義〉，見《解放與改造》，第一卷第八號。

㉘ 戴季陶：〈從經濟上觀察中國的亂源〉，載《建設》，第一卷第二號。

㉙ 李大釗：〈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載註㉑書，頁180-84。

㉚㉛㉜ 見林茂生等編：《陳獨秀文章選編》，中冊（北京：三聯書店，1984），頁92-93；91-92；92-93。

㉝ 張東蓀：〈由內地旅行所得之又一教訓〉、〈現在與將來〉，見蔡尚思主編：《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第一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

㉞㉟ 〈中國的社會主義與世界的資本主義〉，載註㉑書，頁454-55。

㊱㊲ 李達：〈討論社會主義並質梁任公〉，載註㉑書，頁704-21。

㊳ 梁啟超：〈覆張東蓀書論社會主義運動〉，載《改造》，第三卷第六號。

㊴ 可參見唐文權：《覺醒與迷誤——中國近代民族主義思潮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頁137-44。

㊵ 這裏可以對照華倫斯坦的分析，他認為民族國家體系實際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根本組成要素，既有的各種反資本主義運動都是以國家為活動單位，從而難以撼動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本身，反容易被這一體系所同化。參見氏著 *Historical Capitalism*。

㊶ 例如，中共史家所謂的「立三路線」即是一例。李立三在1930年實際主持中共工作時，認為當時的西方經濟危機和中國軍閥混戰意味着直接革命形勢已經到來，並認為中國是各種矛盾的焦點，從而提出中國紅軍出擊，首先取得一省或幾省的勝利，國際帝國主義必定要全面干涉，再由蘇聯出兵，實施全球總決戰。這種論說在共產國際支配下的中共主流思想眼裏，只能是異端。可參見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編印：《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六冊（北京，1979），頁102-30。